

我们的通识教育

蔡达峰 著

我们的通识教育

蔡达峰 著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通识教育 / 蔡达峰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11

(复旦通识丛书)

ISBN 978-7-108-05976-5

I. ①我… II. ①蔡… III. ①通识教育—研究 IV. ①G40-0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8146 号

责任编辑 杨柳青 韩瑞华

封面设计 鲁明静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24

字 数 265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总 序

进入新世纪,“通识教育”在中国大学方兴未艾,生机勃勃,这无疑是中国大学教育自我更新的新起点。“通识教育”旨在关心人格的修养、公民的责任、知识的整全、全球的视野,进而为新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接续与光大承担起自身的责任。

通识教育是教育自我反思的产物,它要摆脱“概论”式“知识传授”的陋习,要摆脱教学与育人脱节的怪圈;它要努力将课堂与书院构建成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学术-生活共同体,培养学生的学术想象力、理论贯通力、阅读与思考的能力以及写作与表达的能力,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扎实的基础。

“通识教育”须依托于专业教育,它需要教师具备相当的专业学术积累,同时要求教师能够自觉地克服专业视野本身的局限,这无疑对教师的知识结构、理论视野、教学方法以及学术修养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因而“通识教育”在中国同时也是教师自我挑战与成长的过程。

在通识教育改革的探索中,复旦大学敢为天下先,率先在国内的大学中提出“通识教育”的原则。2005年成立“复旦学院”至今,逐步形成了以五大“住宿书院”与七大模块“核心课程”为代表的复旦通识教

育模式,并以此为载体全面构建了复旦通识教育体系。我们的愿景日趋清晰,我们的行动路线更加务实。

“复旦通识”丛书正是我们推进复旦乃至整个中国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复旦的创新实践以及国内外各高校的经验积累,我们要为中国的通识教育开创自身的传统,确立自身的标尺,践行自身的道路,同时也需要借鉴世界文明传统中的优秀成果。丛书初步拟定分三大系列:

“读本系列”:它是教师在核心课程教学基础上的独立著述,是服务于教学工作的学术著作;它绝不是普及性的概论式读物,而是注重思想性与理论高度的论著。读本围绕教学内容,并在教学基础上发散出去,既有聚焦的深度,又有视野的广度;有知识,更有关怀。读本可作为核心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参考用书,也将成为好学之士进入相关领域的路线图。通过这个系列,教师的教学成果得以逐渐积累,课程内涵得以不断升华,从而真正实现教学与科研的结合。

“译介系列”:它重在译介域外那些将通识教育纳入世界文明统序中考察的标志性著述。译著重视论题的历史脉络,强调理论视野与现实关切;其论题不会只限于通识教育,不会就观念谈观念,就方法谈方法,而是在广泛的知识背景下深入对某一专题的认识,包括对通识本身的理解。大学教育,尤其是通识教育,承载着一个文明的传统赓续与精神形塑,它存亡继绝又返本开新。通过针对性的译介工作,希望能够为中国通识教育提供更宽广的思想脉络和更扎实的现实感,进而更加明确中国通识教育的历史使命和伟大目标。

“论丛系列”:通识教育既需要大学管理者的决策推动,又需要教师的持续努力,更需要学生的积极投入。通识教育背后的根本动力是

大学管理者、大学教师与大学生们对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及其使命的高度认同和思想共识。大学通识教育的实践者们既是行动者,也是思想者。他们的思考永远是最鲜活的,其中既有老校长们对于通识教育高瞻远瞩的观念梳理、问题诊断以及愿景展望,也有广大教师针对具体课程脚踏实地的反思与总结,更有学者对高等教育以及通识教育领域精深细致的研究。

我们希冀这一丛书能够帮助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实践进一步凝聚共识,明确方向,扎实推进。惟愿“复旦通识”丛书不断推陈出新,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是为序。

“复旦通识”丛书编委会

自序

复旦大学复旦学院计划编印出版通识教育的丛书,学院领导嘱我把自己的有关文稿整理出来。我感谢他们给我提供的机会,佩服他们为通识教育发展所做的谋划。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确实有许多需要思考的问题,需要有理论上的研讨,需要有实践上的积累。

按我的理解,学院编印丛书,或许有资料保存和工作参考的意图。为此,我遴选文稿时,尽量聚焦通识教育这个主题,尽可能不选其他教育话题的文稿,尽量真实地反映自己的认识和事实经过,尽可能选用自己所写或所讲的文稿^①,尽可能注明文稿的用途和背景。

在文稿的编排中,我选了“我们的通识教育:关心人与社会的发展”作为总的概述,它比较完整地表达了自己对通识教育的认识。所谓“我们的”通识教育,即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乃至中国大学的教育,不针对国外的通识教育,这表明了自己思考通识教育问题的基本立场

^① 这里收录的文稿,除“通识教育”访谈选编、“通识教育”报道选编以外,均为本人执笔撰写。注释中引用了部分不是本人撰写的材料,用于反映事实经过。已收录在本人文集《大学:为了学生与社会》中的文稿,均做注解。

和用意。其余文稿,按内容分为三编。每编的第一篇是综述性的,其余按用途分类,再按成文时间先后编排,以便反映工作经历。

“上编”中的文稿,都是针对人格培养、面向大学生所写所讲的。因工作需要,我有不少与学生交流的机会,包括每年的新生入学教育大会、致新生的欢迎信、本科生学术研究资助计划总结大会、各类学生座谈会或论坛讲座等。利用这些机会,我总试图宣传人格培养的重要性,尽管内容相当浅薄,编在一起还显得重复,但我还是认为,这是通识教育的基本任务,也是教育工作者提高自身认识的机会。大学搞通识教育应该有明确的动机或目的,尽管它的具体内容可以讨论,但我坚信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一定是其中的要义。这个意义不能被弱化或异化,也不能望文生义、自以为是地解读。人格是人的素质之基,是学生的本质需要,完善人格是学生必须具备的意识和能力。大学始终要面向学生,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向学生宣讲人格,让学生理解人格,与学生互动共建通识教育,这样对学生最有益,对大学最有益。不必非得等到课程和管理举措成熟之后,再去启发学生对人格的思考。

“下编”中的文稿,都是针对校外的(政府和社会)、针对素质教育而言的。作为民进会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我有许多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机会,这使我可以将本职工作与社会、政府工作结合起来,既宣传通识教育,又促进自己对通识教育的认识。大学推进通识教育,不是自娱自乐,更不是自找麻烦,而是出于文化使命。客观地说,新世纪初中国大学兴起通识教育,反映了国家发展的需要,直接受国家发展的推动。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全面素质教育,从人的本质需要和培养合格公民的需要出发,针对应试教育倾向,提倡从德智体美诸方面培养人的素质。这是政府和社会始终要坚持的教育目标,也是大

学、中学和小学始终要担当的责任。大家都要有这样的共识,教育应该优先发展,教育发展首先要重视素质,重视素质就要构建公民教育体系,使8~22岁的青少年不总是在智力测试中竞争,而是在小学接受养成教育、形成良好的生活意识和行为习惯,在中学接受成人教育、形成良好的自主意识和人际意识,在大学接受通识教育、形成健全的人格和社会意识,从而以良好的素养和能力进入职业界,使自己不断进步,并为大众造福,这就是全面素质教育之路。如果不讲个人素质只讲分数,不讲教育体系只讲学校排名,则谈不上公民教育。如果成人不明确自身应该追求的行为方式、权利义务、道德规训,不清楚自身与他人、社会、国家的关系,不了解中国历史、地理疆域、宪法制度等,则人生有盲目性,对职业界、社会和国家也是不安的因素,自然就会有“人们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能力水平有待提高”的大问题^①。而大学是公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大学搞通识教育,必须针对人的素质问题,研究人与社会的生活,给学生以文明的启迪,这是方向性问题,不能把通识教育当作灌输知识的名堂。大学搞通识教育,必须弄清自身在素质教育体系中的对象和功能,针对成年公民的特征和发展需要,发挥学术研究的优势。大学搞通识教育,客观上也受到基础教育的影响,大学应该正视现实问题,不推诿和抱怨,勇于担当,克服困难,为素质教育发挥引导、呼吁和弥补的作用。

“中编”中的文稿,都是针对大学、针对教育教学改革而言的。进入新世纪,复旦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大势中,勇于创新,争取先进,

^① 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富有作为。通识教育在其中创建,一边增加共识,一边决策实施,不断处理矛盾,不断设法完善,取得了一些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包括创立复旦学院及书院、通识教育研究中心,创设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开展通识教育全校大讨论,筹建新的本科生院等。这些事件在学校的大事记、年鉴和档案中都有正式的记载,各位参与者也有各自的记录。我在其中边做边学边写的东西,浅薄而又散杂,还有遗失遗忘和错漏^①,但总算是真实的,或许有些参考价值。

199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全面素质教育的目标。学校召开“暑期本科教学工作研讨会”,主题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强创新人才培养”。我参加会议并主持了部分议程,开始了解教育形势和学校情况。下半年,学校开展教学计划修订,目标是推进学分制建设,使教学培养更规范、更宽泛、更科学。11月,我撰写了《学分制建设的设想》。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步认识了素质教育、学分制和课程的关系。素质教育是教育目标,学分制是课程管理制度。目标决定制度的需求,引领制度建设。制度落实目标的要求,保障目标实现,它们是表里关系,既相互支撑,又相互制约。它们聚焦在大学的课程建设上,就是要促进课程功能(教学内容)和课程管理(提供方式)的协调,以适应当下全体大学生素质培养的目标和要求,这就逐渐引发了自己对通识教育的关注。

^① 本人于1999年7月至2003年9月担任复旦大学教务处处长,2003年3月至2011年6月担任分管教育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工作中写了不少文稿。但因保存和电脑病毒的缘故,遗失了一些文稿和记录(包括2005年的文稿和工作日程表),致使不能准确记述文稿的工作背景。本编选取的是其中已公开或失效的一些文稿,并在本文中用黑体注明。

2000年1月,教务处召开“寒假教学工作研讨会”,主要任务是上半年完成“本科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修订的目的之一是深化教育改革和素质教育。我代表教务处主持会议并做了“培养方案需要修订”的工作报告,向校党委暑期扩大会提交了题为“深化教学管理改革,拓宽人才培养途径”的报告。这两份材料在培养目标的表述中,都流露出关于通识教育的思考。此外,我还起草了“本科教育发展规划方案”。

2001年初,我起草了《本科教育“十五”发展计划》,并向校党委暑期扩大会提交了《全面推进学分制建设的可行性报告(讨论稿)》^①。按照学校“学期工作要点”中关于全面推进学分制建设的部署,我起草并报送了《文理教育方案》,《报告》和《方案》中都提出了文理教育和文理基础课程的设想,通识教育开始从培养目标落实到课程建设。

2002年7月,我向校党委暑期扩大会提交了“本科教学的回顾与展望”的交流材料,提出了全校性素质教育课程、建立文理教育课程研究中心、文理教育管理的设想和建议,撰写了《通识教育的思考》。

2003年,按照全面推进学分制建设计划,我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开展文理基础课程、综合教育课程、公共基础课程的调研和调整。

2004年5月,我编写了《关于实施文理教育管理方案的思考》。学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文理教育初步方案》,决定2005年成立文理学院(即现在的复旦学院)。9月8日学校召开了文理教育工作研讨会,9月21日召开了文理学院筹建讨论会,11月1日召开了文理学院筹备会议。至此,通识教育以文理教育的名称,从课程建设拓展到培

^① 主要内容收录于《大学:为了学生与社会》(蔡达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第164页)。

养体制,启动了复旦学院的筹备工作。

2005年1月,教务处向校党委寒假务虚会议提交了《文理学院组建方案》。学校委派张晖、许平协助本人研究起草书院教育活动计划。9月,复旦学院正式成立,书院体制开始运行,全校本科新生培养管理工作实现了重大转变。11月,复旦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中心成立,启动了通识教育研究工作,筹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准备2006年秋季开课。熊思东、陆靖、熊庆年、王德峰任中心的副主任,我任主任并起草了《通识教育研究的背景与目的》。12月,我在中心召开的研讨会上讲了“我对通识教育的认识”问题,之后撰写了《通识教育的启动策略》。这是复旦创建通识教育过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复旦学院及书院、中心的成立,为通识教育奠定了地位,也开启了更为艰难的建设历程,大量具体而复杂的困难迎面而来。

2006年,《学校年度工作要点》提出“加强复旦学院建设,完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要求,我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开展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研究、制定和实施等,确保秋季开课。3月,我撰写了《为什么要开展通识教育研究》一文。5月25日,中心召开第四次主任会议,专题讨论了由王德峰牵头研究和起草的“六大模块”的课程体系方案。秋季开学时,复旦学院向新生开设了50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8月13日,复旦学院举行首届学生结业仪式,完成了首轮运行,我做了题为《深入理解学习与人生的关系》的致辞,希望学生离开复旦学院以后继续关心自身的人格培养。12月,我执笔汇编了《文理学院关怀教育计划》。至此,通识教育有了核心课程和书院两大载体,复旦学院有了基本完备的职能框架,为通识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7年,我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协调和解决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管理中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是落实学校的部署,负责开展全校性通识教育大讨论。4月,我撰写了《深入探索通识教育,促进学生长远发展》和《完善我们的通识教育》两文,起草并提交了《通识教育大讨论计划报告》。5月,在通识教育大讨论全校动员大会上做了《开展通识教育大讨论》的报告。由此,全校教师以各种形式开展了广泛讨论,提出了大量高见,引起极大反响。通识教育从此成了复旦校园中最热门和持久的话题。7月,撰写了《通识教育的目标与计划》。9月,撰写了《推进通识教育的思考》。10月,在上海市高校辅导员会议上做了《给学生开拓前程、和谐发展的力量》的报告。随着核心课程和书院的运行,通识教育受到更广泛的关注,面临更现实的矛盾和问题,包括开课任务落实、课程评价标准、课程结构调整等,需要学校更充分地听取意见和建议,争取更大的共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这正是通识教育对大学发展的意义所在。

2008年,我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推进课程建设。4月,我完成了《全校公共课程改革要求》《课程经费分配办法(草案)》《课程结构调整方案(草案)》的起草工作,组织制订和实施《2008年新的本科教学培养方案》,核心课程增加了六个学分。1月7日、4月8日和4月18日召开了课程结构调整研讨会。1月10日和4月15日召开了课程管理改革研讨会。2月26日和3月17日召开了核心课程管理研讨会。4月17日、5月27日和9月5日召开了专业建设研讨会。为开展通识教育论坛活动,4月10日召开了预备会,4月30日召开了筹备会,5月11日通识教育论坛举办。7月29日召开了本科生院建设讨论会。11月,起草并布置了《建立通识核心课程开课管理机制》,明确了教务处与复旦学院的工作程序:由复旦学院与开课院系、教师沟通后,制订开课计

划；由教务处制定开课待遇等政策，下达开课任务。12月11日召开了核心课程管理工作会。

2009年，我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继续推进核心课程管理与建设，审核复旦学院拟订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管理规定》等。1月6日、4月7日和6月10日召开了核心课程教学工作研讨会。7月23日，在“第三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上做《用学问引导学生的人生态度》的致辞。12月8日，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研讨会上做题为《共同努力，建设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书面发言。另一方面，对培养制度改革提出设想。4月，撰写了《坚持推进通识教育》（原题《完善我们的通识教育》）。6月，按照学校在“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提出的制定“本科培养体制改革与发展方案”的要求，为校党委暑期务虚会议起草了《完善本科生培养制度的设想》。10月，向校领导提交了《本科生学院建设方案（讨论稿）》。复旦学院两年多的运行，使我深切地认识到，复旦学院的职能过于局限，通识教育的目标和效果需要依托更完善的体制。进一步说，从培养人的需要出发，本科管理体制不能立足于专业训练的需要，必须在全校层面上深化改革。

2010年4月2日，我在全校本专科生辅导员会议上做了通识教育报告，就《本科生学院建设方案（讨论稿）》征求各方意见，几经修改，向校领导班子暑假务虚会提交《本科培养体制改革与发展方案（送审稿）》，经党政联席会议批准后，在全校征求意见。8月6日在复旦学院召开了座谈会。8月，我向校党政联席会议暨校长办公会议提交了《关于推进本科培养体制改革工作的建议》，学校决定成立本科生院筹备工作小组，陈立民和我任组长。9月，起草了《筹备本科生院》的工作计划。9月10日、9月25日、10月13日、11月5日和12月24日召开了

五次筹备组工作会议。其间,我代表筹备组执笔和提交了《书院建筑规划与改造报告》《关于留学生培养和海外交流生管理体制调整的报告》《关于组建本科生学院领导班子的报告》。11月,撰写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探索贯通本科教育全过程的通识教育新模式》的任务书,起草了《培养方案编制与执行报告》。

2011年1月,我代表筹备组执笔和提交了《关于本科生导师制度建设要点的报告(讨论稿)》《三份专题报告征求意见的通知》《探索贯通本科教育全过程的通识教育新模式进度报告》。6月以后,本人不再分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业余偶尔写了一些有关的文章,如《我们的本科教育改革》《坚持推进“我们的通识教育”》等。

我认为,改革是中国大学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识教育是改革的方向和任务,犹如经济改革与市场的关系。以我国大学现有的本科培养体制来推进通识教育,必然会长期面临复杂的矛盾和困难。大学决策者不能把通识教育当作孤立的、局部的、本位的需要,既不轻视,也不急于求成。要致力于深化改革,用改革的勇气和智慧,做全局性和系统性的谋划。坚持围绕人格培养的目标,聚焦核心课程(内容、设置、开设、修读等)和住宿学院(内容、方式、条件等)两大载体的建设,努力转变教育观念,改进管理制度,提高培养能力,改善培养条件。等到它们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大学发展自然就上了台阶。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招生是大学培养工作的重要部分。通识教育的推进,直接引发了招生改革,包括全校新生不分专业修读核心课程、安排书院住宿和活动等。2007年复旦在全国率先实行的本科生招生改革试验,其涉及校外的问题、产生的社会影响更甚于通识教育。考虑到主题和篇幅的因素,这类文章这里均不选用。

我的文稿以及表达的感想,都是应实际工作需要而形成的,没有学术价值。它们或许有的价值,只是在于反映了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实践的情况,并希望大家关注这种情况。

作者

2016年3月31日

我们的通识教育： 关心人与社会的发展^①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在欧美倡导了百余年,可谓高等教育理论中既经典又最具活力的部分。它有过各种观点、做法及争议,也面临着新挑战和变革,但它在人才培养上的作用得到了广泛认可。就像密西根大学原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博士所说:“尽管难以给通识教育下定义,它的实现也极具挑战性,但这难以捉摸的通识教育的目标可能依然是使学生为终身学习和变化的世界做好准备的最好途径。”^②

对于通识教育,我国高等教育的先驱们有过很好的见识和倡导。蔡元培先生提倡大学本科要“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③,梅贻琦认为大

① 刊登于《读书》2006年第4期,收录于《大学:为了学生与社会》(蔡达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② (美)詹姆斯·杜德斯达著,刘彤主译,王定华审校:《21世纪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③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68页。